

以色列阿拉伯基督徒社团的德鲁兹化及其影响^{*}

潘楠

内容提要 冷战结束后以色列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在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地位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促使其沿着“以色列-德鲁兹模式”展现出明显的德鲁兹化趋势。阿拉伯基督徒社团与德鲁兹社团相比,人口规模相当、文化均较为独特、历史境遇类似、面临现状趋同,这成为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德鲁兹化的前提基础,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以色列建国初期的萌芽阶段、冷战时期的消极阶段以及后冷战时代的积极阶段。阿拉伯基督徒社团的德鲁兹化具有时代特征鲜明、兵役制度优先和利益决定效果三大特征,对以色列境内其他阿拉伯群体、对以色列民族国家的构建都产生了影响,对以色列国进行族群治理有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但是阿拉伯基督徒社团的德鲁兹化进程在该社团内部存在分歧,在社团外部也引发了争议,因而可能会朝着曲折前行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 以色列 阿拉伯基督徒 德鲁兹化 亚拉姆基督徒 “阿拉伯之春”

阿拉伯基督徒社团作为以色列境内少数群体之一(见表1),与同为以色列阿拉伯公民的少数群体德鲁兹社团相比,人口规模相当、文化均较独特、历史境遇类似、面临现状趋同,客观上为以色列当局运用同一模式管理这两个少数群体提供了可行性,主观上使得阿拉伯基督徒社团效仿德鲁兹社团发展与以色列政府的关系具备了可能性。

以色列建国的1948年前后,德鲁兹社团与犹太社团以及以色列国家,因为在以色列独立战争中密切合作而形成同盟关系。1956年以色列当局开始对德鲁兹社团实行义务兵役制,标志着这种同盟关系上升为“血盟(Covenant of Blood)”,“德鲁兹-犹太复国主义盟约(Druze-Zionist Covenant)”应运而生。自此开始,较之以色列境内的其他少数群体,德鲁兹社团在政治参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都享有实质性的特殊优势地位。^①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时,伴随着德鲁兹社团独立族群身份、独立宗教身份、独立社会服务、独立教育系统构建完毕,德鲁兹社团最终成为以色列对国家高度认同且无限忠诚的“最受欢迎的阿拉伯公民”,^②并而逐步广泛且深入地融入了以色列国家体系。德鲁兹社团接受以色列当局义务兵役制的典型举措、因其特殊独立身份相较于以色列其他少数群体所享有的实际优势、对以色列国家的高度认同和无限忠诚、比其他少数群体更广泛深入地融入以色列国家体系,被视作以色列当局处理与少数群体之间关系的“以色列-德鲁兹模式”

^{*} 本文系国家民族研究委托项目(批准号2019-GME-006)的阶段性成果。感谢《世界民族》编辑部老师和评审专家的修改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① 潘楠:《德鲁兹社团与以色列国家关系的变迁(1918—2018年)》,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年第2期。

^② Rabah Halabi, “Invention of a Nation: The Druze in Israel”,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vol.49, no.3, 2014, pp.267-281.

(Israeli-Druze model)”^①表1 以色列人口概况(截至2022年9月20日)^②

分类		数量(万)	占比(%)	宗教
犹太人(Jews)		706.9	73.7	犹太教
以色列阿拉伯公民 (Arab citizens of Israel)	阿拉伯穆斯林(Muslim Arabs)	140	14.6	伊斯兰教
	阿拉伯贝都因人(Bedouin Arabs)	27	2.8	伊斯兰教
	阿拉伯基督徒(Christian Arabs)	14	1.46	基督教
	德鲁兹人(Druze)	14	1.46	伊斯兰教德鲁兹派
	切尔克斯人(Circassians)	0.4	0.04	伊斯兰教
其他 (others)	非阿拉伯基督徒(non-Christian Arabs)	49.8	5.19	不信犹太教, 却自称是犹太人, 但是不被以色列当局承认是犹太人
	巴哈伊教徒(Baha'i)			
	撒玛利亚人(Samaritans)			
	卡拉特犹太人(Karaite Jews)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徒(Seventh-day Adventists)			
	弥赛亚犹太人(Messianic Jews)			
	耶和华见证人教徒(Jehovah's Witnesses)			
苏联移民(immigrants from the FSU)				
非法移民等(illegal immigrants, etc.)		7.2	0.75	不详

冷战结束后,受国际国内环境变化的影响以色列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在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地位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使得该社团在发展以色列国家之间关系层面上逐渐沿着“以色列-德鲁兹模式”展现出明显的德鲁兹化(Druzification)趋势,主要体现在为以色列国防军服役表现出某些积极倾向,与以色列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日趋密切。

国内外研究人员已从不同视角注意到以色列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德鲁兹化的趋势,如从以色列阿拉伯人群体首要身份认同的角度分析认为“虽然阿拉伯基督徒对以色列国的认同并非首要认同,但是这一认同呈现出逐年增强趋势”;^③从以色列社会中多次认同群体的角度分析认为“阿拉伯基督徒处于族群感情与国家意识相冲突的两难境地,因为作为阿拉伯大家庭一员感受到周边阿拉伯国家民族主义浪潮的同时,也认识到身为以色列公民有义务忠诚于国家”;^④从以色列当局对

① Ilana Kaufman, “Ethnic Affirmation or Ethnic Manipulation: The Case of the Druze in Israel”, *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 vol. 9, no. 4, 2004, p. 53.

② Jewish Virtual Library, “Vital Statistics: Latest Population Statistics for Israel”, <https://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latest-population-statistics-for-israel>, 访问日期:2022年11月2日。

③ 隆娅玲、马晓霖:《以色列阿拉伯人族群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历史变迁及现实困境》,载《世界民族》,2021年第5期。

④ 艾仁贵:《一个还是多个:认同极化与当代以色列的身份政治困境》,载《西亚非洲》,2020年第4期。

境内阿拉伯人群体实施差异化政策的角度的分析认为“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以色列当局有意推动阿拉伯基督徒社团也像德鲁兹社团那样接受以色列国防军的义务兵役制”;^①从阿拉伯基督徒社团与以色列阿拉伯群体中最大组成部分阿拉伯穆斯林社团之间关系的角度的分析认为“二者之间关系整体上呈现出渐行渐远之势,在此过程中阿拉伯基督徒社团的基督徒宗教身份有所凸显,作用有所上升”;^②从亚拉姆文化在当代以色列复兴的角度的分析认为“自2014年开始,以色列当局给予阿拉伯基督徒社团选择注册为亚拉姆基督徒(Aramaic Christians)新族群身份权利的举措,是历史和现实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③从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场所等得到保护的角度的分析认为“在以色列乃至整个中东地区基督教处于边缘地位,在这一大环境下,阿拉伯基督徒社团的宗教信仰受到了以色列当局的保护,这种情况极为罕见,提升了该社团对以色列国的向心力”^④。

但是,上述既有研究对以色列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德鲁兹化的前提基础、发展变迁、各种影响和主要特征尚缺少系统性的分析与探究。有鉴于此,考察以色列阿拉伯基督徒社团的德鲁兹化趋势很有必要,不仅能够加深对以色列建国以来阿拉伯基督徒社团与国家关系发展变迁的理解,也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到“以色列-德鲁兹模式”在以色列当局处理族群问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把握其进一步的发展动向。本研究以既有相关研究为基础,从“以色列-德鲁兹模式”的视角对阿拉伯基督徒社团与以色列国家的关系进行全面梳理,分析在多族群共同体框架下以色列阿拉伯基督徒社团的德鲁兹化及其影响。

一、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德鲁兹化的前提基础

阿拉伯基督徒社团的德鲁兹化进程,既是以色列当局对境内少数民族尤其是阿拉伯人实行区别性政策的具体表现,也是阿拉伯基督徒社团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主动做出选择的客观结果。一方面,有观点指出以色列当局认为占全国总人口1.46%、占以色列阿拉伯公民总人口7%的阿拉伯基督徒社团,由于社团规模较小,以色列政府对其进行管理的难度远低于占全国总人口14.6%、占以色列阿拉伯公民总人口72%的阿拉伯穆斯林社团,因此,是否将管理德鲁兹社团的模式运用于阿拉伯基督徒社团,早在建国之初便成为以色列当局在管理族群事务领域的考虑事项之一。^⑤另一方面,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和德鲁兹社团在人口规模、文化底蕴、历史境遇和现实状况等诸多方面存在相似性,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在观察与感受到德鲁兹社团相较于其他少数群体在以色列享有的特殊优势地位后,逐步转为主动寻求自身的德鲁兹化。

第一,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和德鲁兹社团在人口基数上的相似性以及在人口出生率上的同步性,使得两社团人口规模长期保持一致。1947年英国委任统治末期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基督徒总人数高达14.3万人,然而1949年以色列独立战争结束后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基督徒仅剩3.4万

① 王宇:《析以色列对境内阿拉伯少数民族的政策》,载《国际论坛》,2014年第6期。

② Ilan Shdema, Ido Zerkovitz and Moshe Sharabi, “The Effects of Islamization on Muslim-Christian Relations within Israel’s Arab Community before and after the ‘Arab Spring’”, *Israel Affairs*, vol. 28, no. 2, 2022, pp. 208 – 231; Ilan Shdema, “The Role of Socio-Economic Factors in Changing Relations between Muslim and Christian Arabs in Israel between 1967 and 2010”, *Islam and Christian-Muslim Relations*, vol. 23, no. 4, 2012, pp. 515 – 530.

③ Rima Farah, “The Rise of a Christian Aramaic Nationality in Modern Israel”, *Israel Studies*, vol. 26, no. 2, 2021, pp. 1 – 28; Merav Mack, “Orthodox and Communist: A History of a Christian Community in Mandate Palestine and Israel”,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2, no. 4, 2015, pp. 384 – 400.

④ Steve Apfel, “A Bias Thicker than Faith: Christians Who Punt for Their Persecutors”, *Israel Affairs*, vol. 18, no. 3, 2012, pp. 403 – 411.

⑤ Una McGahern, *Palestinian Christians in Israel: State Attitudes towards Non-Muslims in a Jewish State*, London: Routledge, 2011, p. 91.

人,与此同时德鲁兹人恰好也在3万人左右,^①因此,两社团的人口基数在1949年因为前者人数骤减而趋于一致。建国后以色列当局长期实行鼓励生育政策,以2018年不同群体每名妇女所育子女人数为指标,犹太人为3.17人、阿拉伯穆斯林和阿拉伯贝都因均为3.2人、阿拉伯基督徒为2.06人、德鲁兹人为2.16人,到2022年以色列总人口与建国时相比增加了10倍以上,^②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和德鲁兹社团相对于境内其他群体而言,因为建国时的人口基数较小和后续的人口出生率较低,成为以色列两个较小的社团,并形成人口规模保持一致的特殊局面。

第二,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和德鲁兹社团在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字上的特殊性,使得两社团的文化底蕴呈现出相似的独特性。一方面,在宗教信仰上两个社团都较为独特:阿拉伯基督徒社团是中东地区为数不多的信仰基督教的群体,历史上特别是英国委任统治时期,因其与西方世界相似的基督教信仰,而被境内其他阿拉伯群体视为受英国委任统治者支持的特权群体;^③德鲁兹教因其神秘性和秘密性,客观上展现出其有别于伊斯兰教的独有特征;^④二者也常常主动寻求与维护自身宗教信仰的内在独特性和外在影响力。^⑤另一方面,在语言文字上两社团与希伯来语关系密切:阿拉伯基督徒社团成员大多居住在以犹太人为主的城市,因此常把希伯来语作为工作中的语言文字使用;^⑥德鲁兹社团成员大多居住在乡村,但是1976年德鲁兹教育体系建成后,各级德鲁兹学校开始使用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进行双语授课。^⑦

第三,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和德鲁兹社团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历史上境遇类似,使得两社团的过往经历表现出较大的一致性。以色列建国前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基督徒和德鲁兹人作为极其微小的少数群体,或多或少都曾经遭受过统治者或较大群体的排挤甚至迫害。一方面,阿拉伯基督徒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因宗教信仰被利用伊斯兰教法治国的统治者视作下等群体,^⑧虽然随着英国委任统治者的到来阿拉伯基督徒因为宗教信仰与西方类似、社团中不少人因为受到过良好教育可以讲欧洲某些国家的语言,其社会地位有所提升,但也因此遭到当地较大群体的嫉妒乃至排斥,^⑨英国统治者在委任统治的前期和后期,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进行的政策调整也并非持续性地有利于阿拉伯基督徒。^⑩另一方面,德鲁兹人在奥斯曼帝国时期被视作异教徒,没有任何形式的自治权甚

① Jewish Virtual Library, "The Druze in Israel: History & Overview", <https://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history-and-overview-of-the-israeli-druze>, 访问日期:2022年11月2日。

② Jewish Virtual Library, "Minority Communities in Israel: Background & Overview", <https://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minority-communities-in-israel-2>, 访问日期:2022年11月2日。

③ Erik Eliav Freas, "Christian Versus Muslim Employment in Mandatory Palestine", *Islam and Christian-Muslim Relations*, vol. 26, no. 3, 2015, p. 359.

④ Merav Mack, "Will 'Education for Tradition' Be Enough in a Closing Circle of Secrets? The Case of the Israeli Druze", *Religious Education*, vol. 109, no. 5, 2015, p. 489.

⑤ Shai Wineapple and Ruth Kark, "Mission Impossible: The Christian Mission and the State of Israel, 1948-65", *Israel Affairs*, vol. 27, no. 3, 2021, p. 427.

⑥ Faisal Azaiza, Rachel Hertz-Lazarowitz, Meyrav Shoham, Muhammad Amara, Aura Mor-Sommerfeld and Nohad 'Ali, "Attitudes towards Bilingual Arab-Hebrew Education in Israel: A Comparative Study of Jewish and Arab Adults", *Language, Culture and Curriculum*, vol. 24, no. 2, 2011, pp. 179-193.

⑦ Salim Abu-Rabia, "Druze Minority Students Learning Hebrew in Israel: The Relationship of Attitudes,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Interest of Material to Reading Comprehension in a Second Language",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vol. 17, no. 6, 1996, p. 415.

⑧ Norman Russell, "Christian Identity, Sharia Law and voluntary Martyrdom in the Ottoman Empi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vol. 18, no. 2-3, 2018, pp. 158-172.

⑨ Daphne Tsimhoni, "The Status of the Arab Christians under the British Mandate in Palestine",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20, no. 4, 1984, pp. 166-192.

⑩ Konstantinos Papastathis, "Religious Politics in Mandate Palestine: The Christian Orthodox Community Controversy in the Thirties",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3, no. 3, 2016, pp. 259-284.

至未能享有公共权利系统例如宗教法庭等,统治者只在对土地进行分类登记和对男性进行征兵时才会标签式地将德鲁兹人标注为“穆斯林”或“其他”,^①虽然德鲁兹人在英国委任统治时期获得了当局给予的独立社团身份,但是因为统治者与犹太社团的密切关系等因素,德鲁兹社团在巴勒斯坦长期处于边缘地位。^②共同的过往经历和历史记忆,使得两社团有可能通过类似途径——例如与当地统治者建立特殊友好关系,来增强自身安全感。

第四,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和德鲁兹社团在以色列建国后面临相似的局面,使得两社团的现实选择展现出一定的趋同性。其一,两社团在自身独立族群身份的构建上逐步趋同。以色列当局在建国之初便积极支持德鲁兹社团建立独立的族群身份,此举主要是为该社团在以色列国防军服义务兵役制扫清障碍,因为德鲁兹青年由此能够以“德鲁兹人”的身份而非“阿拉伯人”的身份入伍;^③以色列建国以来,当局总体上倾向于强调阿拉伯基督徒社团的原住民身份,在强调其“东方基督徒(Eastern Christians)”身份的同时弱化了“阿拉伯基督徒”身份,^④2014年,以色列政府宣布阿拉伯基督徒可在人口管理部门登记为亚拉姆基督徒(Aramaic Christians),^⑤阿拉伯基督徒社团也开始思考是否接受“东方基督徒”这一彰显其独立族群身份的立场。^⑥其二,两社团在响应兵役号召上逐步趋同。以色列建国之初当局曾考虑大范围吸纳阿拉伯基督徒等少数群体服役,^⑦但是由于某些因素的影响,少数群体中仅德鲁兹社团随后被纳入义务兵役制,但进入21世纪以来政府试图结束对阿拉伯基督徒服役的豁免,并通过征召阿拉伯基督徒入伍的实质举措,阿拉伯基督徒也开始积极响应当局的兵役号召。^⑧其三,两社团在独立教育体系的构建上逐步趋同。早在1976年以色列政府便建立了德鲁兹中小学教育体系,而亚拉姆传统文化在以色列土著基督徒群体中得以复兴,绝大多数基督徒青少年就读于基督教教会赞助的私立学校,^⑨在客观上推动了阿拉伯基督徒的教育体系逐渐与阿拉伯语和阿拉伯学校走向分离,实现独立。其四,两社团对以色列国家的认同归属感逐步趋同。德鲁兹社团以对以色列国家无限忠诚而著称,虽然在较长的历史时段内阿拉伯基督徒对以色列国家的认同有模糊性,但是2010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对以色列国家的认同感大幅提升,根本原因在于以色列成为“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中东地区唯一的基督徒不受“阿拉伯之春”影响乃至因此遭受迫害的国家。^⑩

① Walter Zenner, “Aqili Agha: The Strongman in the Ethnic Relations of the Ottoman Galile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13, no. 2, 1972, p. 170.

② Eliahu Epstein, “The Druzes of Palestine”, *Journal of the Royal Central Asian Society*, vol. 29, no. 1, 1942, p. 56.

③ Hillel Frisch, “The Druze Minority in the Israeli Military: Traditionalizing an Ethnic Policing Role”, *Armed Forces & Society*, vol. 20, no. 1, 1993, pp. 51 - 67.

④ Quinn Coffey, “Israel Passes Legislation to Reclassify Its Christian Citizens as ‘Non-Arab’”, *Open Democracy*, March 3, 2014.

⑤ Yael Test Blogger, “Christian Arabs Can Now Register as Aramaic Christians, not Arabs”, *The Jerusalem Post*, September 17, 2014, <https://www.jpost.com/israel-news/christian-arabs-can-now-register-as-aramaic-christians-not-arabs-375646>, 访问日期:2022年11月5日。

⑥ Gabriel Horenczyk and Salim Munayer, “Acculturation Orientations towards Two Majority Groups: The Case of Palestinian Arab Christian Adolescents in Israel”,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vol. 38, no. 1, 2007, pp. 83 - 84.

⑦ Yoav Gelber, “Israel’s Policy towards Its Arab Minority, 1947 - 1950”, *Israel Affairs*, vol. 19, no. 1, 2013, pp. 51 - 81.

⑧ David Lev, “Christian Leader: ‘We Want to Defend the State’”, *Israel National News*, August 5, 2013, <https://www.israelnationalnews.com/news/170619>, 访问日期:2022年11月5日。

⑨ Rivkah Lambert Adler, “Five Things to Know about Israel’s Christian Population”, *The Jerusalem Post*, March 1, 2022, <https://www.jpost.com/christianworld/article-698959>, 访问日期:2022年11月5日。

⑩ David Parsons, “Mideast Christians Are the Litmus Test of Arab Spring”, *The Jerusalem Post*, December 24, 2011, <https://www.jpost.com/Opinion/Columnists/Mideast-Christians-are-the-litmus-test-of-Arab-Spring>, 访问日期:2022年11月6日。

二、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德鲁兹化的发展变迁

在理论上,阿拉伯基督徒社团也可以因为各方面与阿拉伯穆斯林社团存在较大差异,在社团规模、文化底蕴、历史境遇、面临现状等多方面与德鲁兹社团却非常类似,在以色列建国之初便存在着将其与阿拉伯贝都因人、切尔克斯人这两个少数群体一道,参照“以色列-德鲁兹模式”,同犹太社团以及以色列国家之建立密切关系的可能性。^①但是受某些国际国内因素影响,在1954年以色列总理大卫·本-古理安(David Ben-Gurion)公开宣布“免除德鲁兹社团以外其他阿拉伯公民的义务兵役”后,长期以来双方并没有正式形成这种特殊关系,^②阿拉伯基督徒社团的德鲁兹化进程不仅较为缓慢而且非常曲折。

首先,以色列建国初期,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徘徊于其阿拉伯人和基督徒身份之间,并借此在以色列政治参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对德鲁化并不热衷。一方面,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在国内政治上脱颖而出;1948年以色列独立战争打破了巴勒斯坦地区原有的社会平衡,众多阿拉伯人逃往邻国改变了该地区的族群结构,^③但因战争所致的社会失序,客观上又将受教育水平较高、人口出生率较低、素质较高,且绝大多数成员居住于城市的阿拉伯基督徒社团推上历史舞台,在以色列少数群体政治参与中起到了引领作用;^④并且在冷战初期这一特殊时代背景下,阿拉伯基督徒社团精英阶层成员加入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政党,参与议会政治。^⑤另一方面,在国际政治层面阿拉伯基督徒社团选择顺势而为:在苏联的强大压力下巴共(犹太派)和民族解放联盟(主要是阿拉伯派)在1948年10月22日被迫重新合并,同时更名为以色列共产党,在议会中获得合法地位。^⑥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在以色列的政治参与无法摆脱美苏两极对峙的大环境,其政治目标与以色列共产党的目标一致,即为阿拉伯人争取合法权利,特别是通过法律形式保证阿拉伯人作为少数群体在以色列享有充分的族群和公民权利;^⑦所以,对于阿拉伯基督徒社团而言,基督徒身份无论是在阿拉伯公民群体内部,还是在以色列政治体系中的政治参与,均无显著影响。基于以上国内国际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彼时以色列当局在处理少数群体事务上尚处于摸索阶段,^⑧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对德鲁兹化既无内在自身诉求的引导,也缺少外部客观环境的激发。

其次,整个冷战期间,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倚重其阿拉伯人的身份而忽略其基督徒身份,在以色列社会生活中争取实现社团利益最大化,因此对德鲁兹化也不积极。一方面,阿拉伯人的身份有利于其参与和平的社会生活,1951年以色列当局出台了《义务兵役法》(*The Compulsory Military Service Law of 1951*),规定年满18周岁的公民必须入伍,但也明确国防部长有权出于宗教和民族因素考虑

① Yusri Hazran, “A People that Shall Dwell Alone; Is that So? Israel and the Minorities Alliance”,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56, no. 3, 2020, p. 396.

② Hillel Frisch, “Israel and its Arab Citizens”, *Israel Affairs*, vol. 11, no. 1, 2005, pp. 207 – 222.

③ Ilana Feldman, “The Challenge of Categories: UNRWA and the Definition of a ‘Palestine Refugee’”, *Journal of Refugee Studies*, vol. 25, no. 3, 2012, pp. 387 – 406.

④ Gabriel Horenczyk and Salim J. Munayer, “Acculturation Orientations toward Two Majority Groups: The Case of Palestinian Arab Christian Adolescents in Israel”,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vol. 38, no. 1, 2007, pp. 76 – 86.

⑤ Merav Mack, “Orthodox and Communist: A History of a Christian Community in Mandate Palestine and Israel”,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2, no. 4, 2015, p. 384.

⑥ 冯毅:《犹太复国主义实践进程中的共产主义运动》,载《外国问题研究》,2020年第2期。

⑦ Amir Locker-Biletzki, “Judaism and Communism: Hanukkah, Passover, and the Jewish Communists in Mandate Palestine and Israel, 1919 – 1965”, *Journal of Israeli History*, vol. 34, no. 2, 2015, pp. 141 – 158.

⑧ Yoav Gelber, “Army and Society in Israel”, *Pacific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16, no. 2, 1973, pp. 143 – 165.

豁免某些个人或团体服役;^①此后德鲁兹社团之外的阿拉伯少数群体几乎全部被排除在义务兵役制之外。^②阿拉伯基督徒以其阿拉伯人的身份而不必服役,在四次中东战争期间因不必参军而获得了在和平环境下生活、工作与求学的机会,并避免了1948年后作为以色列阿拉伯公民直面“我的国家在与我的族群作战”的尴尬境地。^③另一方面,基督徒身份因其无显著的政治功效而被忽略,基督徒身份的传统作用,是彰显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在以色列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独特性,^④但在这一时期阿拉伯基督徒不需要在各领域都体现其独特性,因为他们在政治、教育和就业等方面所享有的相对优势暂未受到其他群体的挑战。^⑤因此,在这一阶段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并未积极谋求自身的德鲁兹化,推动这一进程会稀释乃至剥离其阿拉伯人的身份,甚至在中东战争频发的时期被赋予义务兵役制而直面战争。

最后,在冷战结束后,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弱化其阿拉伯人的身份而凸显基督徒身份,在以色列民主进程中寻求社团的不断发展,因此积极寻求自身的德鲁兹化。冷战结束前后社会地位的变化致使其对阿拉伯人的身份再度评估后而选择弱化,伴随着其他阿拉伯群体尤其是阿拉伯穆斯林社团在政治、教育和就业等领域的迅速崛起,特别是阿拉伯城市人口的高速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大力推进,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在社会中的优势地位已不再明显;^⑥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阿拉伯基督徒社团与其他阿拉伯群体因教堂建设等问题发生冲突时,发现无论是与人多势众的阿拉伯穆斯林社团相比,还是较之因服义务兵役制而拥有武力作为后盾的德鲁兹社团,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在冲突中都处于劣势。^⑦阿拉伯人的身份凸显的是竞争甚至是冲突,故而阿拉伯基督徒社团逐渐弱化其阿拉伯人的身份。此外,2010年“阿拉伯之春”的爆发促使其重新审视基督徒的身份。“阿拉伯之春”导致以色列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基督徒外流甚至紧急逃离,^⑧此时以色列作为中东地区政治相对稳定的民主国家,小到保障包括阿拉伯基督徒在内的所有基督徒群体做礼拜等宗教自由,大到保护社团发展乃至生存,^⑨因此阿拉伯基督徒社团日益强调并倾向其基督徒身份。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发现在以色列这个中东地区唯一的基督徒人口实际增长的国家,其基督徒身份对于维护社团自身利益起到正向作用,故积极主动地推进自身的德鲁兹化成为其更好地融入以色列国家的优选途径。^⑩

① CPTI, “Submission to the 97th Session of the Human Rights Committee: October 2009 Conscientious Objection to Military Service and Related Issues for the Attention of the Country Report Task Force on Israel”, http://www2.ohchr.org/english/bodies/hrc/docs/ngos/CPTI_Israel97.doc, 访问日期:2022年11月6日。

② Ayad Al-Qazzaz, “Israel’s Policy towards Its Arab minority, 1947 – 1950”, *Israel Affairs*, vol. 19, no. 1, 2013, p. 51.

③ 王宇:《以色列国防军中的阿拉伯士兵——身份尴尬的少数民族与兵役义务》,载《世界民族》,2014年第2期。

④ Elie Rekhess, “The Arab Minority in Israel: Reconstructing the ‘1948 Paradigm’”, *Israel Studies*, vol. 19, no. 2, 2014, pp. 187 – 217.

⑤ Ilan Shdema, “The Role of Socio-Economic Factors in Changing Relations between Muslim and Christian Arabs in Israel between 1967 and 2010”, *Islam and Christian-Muslim Relations*, vol. 23, no. 4, 2012, p. 520.

⑥ Hugh Goddard, “Challenges and Developments: Christian-Muslim Rela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vol. 3, no. 2, 2003, pp. 15 – 35.

⑦ Samuel Kuruvilla, “Palestinian Christian Politic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Case of Jerusalem’s Churches and the Indigenous Arab Christians”, *Holy Land Studies*, vol. 10, no. 2, 2011, pp. 199 – 228.

⑧ Max Guirguis, “The Coptic Christian Minority in Contemporary Egypt Since the Arab Spring”, *The Journal for Interdisciplinary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3, no. 4, 2018, p. 37.

⑨ Lars Berger, “Democratic Values and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Arab Support for Peace with Israel”,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 36, no. 3, 2019, pp. 270 – 290.

⑩ Maayan Jaffe-Hoffman, “Participants Will Each Read a Chapter from the Book of Isaiah, the Main Character Who Prophesied the Destruction of Babylon and the Return of the Jewish People to Israel”, *The Jerusalem Post*, July 12, 2021, <https://www.jpost.com/judaism/israelis-to-read-isaiah-join-bible-reading-marathon-for-first-time-673579>, 访问日期:2022年11月7日。

三、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德鲁兹化的影响

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中东“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以色列阿拉伯基督徒社团的德鲁兹化进程明显加快。从外部看,这是全球范围内冷战结束国际新格局出现,以及地区范围内中东“阿拉伯之春”这一阿拉伯世界的社会运动浪潮,在以色列境内所引发的蝴蝶效应;^①从内部看,这是以色列国的族群治理问题在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下不断演化的结果。以色列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德鲁兹化的主要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以色列其他阿拉伯群体的影响和对以色列民族国家构建的影响上。

首先,阿拉伯基督徒社团的德鲁兹化,对阿拉伯穆斯林社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治层面上。作为以色列国家最大的少数群体阿拉伯穆斯林社团有观点认为当局对阿拉伯公民实行“分而治之”政策,^②即把文化同质性较高的阿拉伯公民群体分成了几个大小不一的单元管理,^③阿拉伯穆斯林社团对当局的上述举措时常表示不满。以色列建国之初阿拉伯基督徒社团消极应对当局推行的德鲁兹化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④但是,冷战结束后阿拉伯基督徒社团主动顺应德鲁兹化进程也是不能忽视的客观现实。因此,在阿拉伯基督徒社团与阿拉伯穆斯林社团因为社会地位存在差异等因素而渐行渐远时,又因为族群认同发生变化而逐渐疏离,^⑤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当局如何运用合理而有效的手段,进一步妥善应对阿拉伯基督徒社团的德鲁兹化进程,无论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会对阿拉伯穆斯林社团在政治层面上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其次,阿拉伯基督徒社团的德鲁兹化,对阿拉伯贝都因人社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层面上。一方面,长期以来以色列境内阿拉伯贝都因人社团内部的复杂性,^⑥加大了当局处理与该社团之间关系的难度。另一方面,以色列政府与阿拉伯贝都因人社团的关系目前正处于转折点,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色列阿拉伯贝都因原住民话语渐入公共视野,当局无法回避在建国后没收南部内盖夫阿拉伯贝都因人土地的问题,^⑦这对以色列国家而言却是难题,因为选择给予阿拉伯贝都因人原住民的权利固然有助于保持其文化传统并提升对国家的认同,但也意味着阿拉伯贝都因人这个因土地问题与当局抗争已久的群体,再难从对土地依赖度极高的部落社会过渡到现代定居者社会,^⑧当局的选择涉及促进还是阻碍社会经济整合的问题。在此背景下,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广泛融入国

① Alon Ben-Meir, “The Persecution of Christians in the Middle East”, *The Jerusalem Post*, December 18, 2016, <https://www.jpost.com/Blogs/Above-the-Fray/The-Persecution-Of-Christians-In-The-Middle-East-475515>, 访问日期:2022年11月7日。

② Oded Haklai and Rida Abu Rass, “The Fourth Phase of Palestinian Arab Politics in Israel: The Centripetal Turn”, *Israel Studies*, vol. 27, no. 1, 2022, p. 35.

③ Ilan Saban, “Minority Rights in Deeply Divided Societie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and the Case of the Arab-Palestinian Minority in Israel”, *New York Univers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s*, vol. 36, 2004, pp. 942-948.

④ Jerusalem Post Staff, “Don’t Neglect Christian Arabs”, *The Jerusalem Post*, March 3, 2006, <https://www.jpost.com/Opinion/Editorials/Dont-neglect-Christian-Arabs-file>, 访问日期:2022年11月7日。

⑤ Yvonne Yazbeck Haddad, “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 Anglicans in Palestine/Israel and Christian-Muslim Relations”, *Anglican Theological Review*, vol. 96, no. 1, 2014, p. 109.

⑥ 截至2022年9月,以色列阿拉伯贝都因人总人口约27万,主要因土地归属问题而与以色列当局的关系各异:(1)南部内盖夫(Negev)地区约有21万人,其中30%仍希望保持传统的牧业,因此对土地的诉求很高,与当局时常关系紧张;(2)中部地区约有1万人,主要是20世纪50年代从内盖夫迁来的无地牧民的后代,已融入当地城乡社会,由于其先辈本就无地,因此对土地基本无诉求,与当局的关系相对平稳;(3)北部加利利和耶斯列山谷(Galilee and Jezreel Valley)地区约有5万人,其先辈在以色列独立战争期间主动加入了犹太人的军队,以色列建国后又积极地以志愿兵身份加入以色列国防军,他们不仅对以色列国家有强烈的认同感,同时认为自己也像德鲁兹社团那样与以色列国家存在“血盟”关系。建国后当局不仅没征用他们的土地,甚至对其某些违反《建筑法》的行为表现出宽容态度。参见 Yosef Ben-David, “Minority Communities in Israel: The Bedouin”, <https://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the-bedouin-in-israel#negev>, 访问日期:2022年11月8日。

⑦ 高霞、宋立宏:《以色列贝都因人的原住民话语:发展与争议》,载《世界民族》,2020年第1期。

⑧ Kassim Alsrailha, “From a Boss to a Leader? Transformations of Representational Leadership in the Arab-Bedouin Minority in Israel”, *Journal of Muslim Minority Affairs*, vol. 40, no. 2, 2020, p. 283.

家经济体系客观上为阿拉伯贝都因人社团树立了标杆。阿拉伯基督徒大多生活在城市且普遍处于社会中上层,当局可以此向包括阿拉伯贝都因人社团在内的其他少数群体宣传“公民融入以色列现代社会体系,并非以拥有土地为基础”的政治主张。此外,二者在服役问题上有可能产生互动。1948年以来部分阿拉伯贝都因人由于熟悉沙漠而以志愿兵身份在沙漠侦察部队服役,^①但在服役以外的其他领域仍难融入以色列社会,2013年当局出台贝京计划(Begin Plan),部分目标旨在改变这一点;^②与之相反,阿拉伯基督徒社团融入了大部分的国家经济生活,但是在服役方面的进展却相对缓慢;因此,若阿拉伯基督徒社团能够广泛服役,可能会对阿拉伯贝都因人社团起到激励作用,加强后者在整体上而不是仅限于北部阿拉伯贝都因人对以色列国家的认同感和向心力。

第三,阿拉伯基督徒社团的德鲁兹化,对德鲁兹社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文化层面上。德鲁兹社团与犹太社团以及以色列国家之间总体上保持着以“血盟”为纽带的特殊友好关系,但双方亦有分歧。尽管以色列政府对德鲁兹社团建立了针对性的教育体系并且实施了倾斜性的优惠政策等,^③从而使得德鲁兹社团与犹太社团以及以色列国家之间的分歧始终能够容纳在犹太复国主义的框架之内,并且建立在德鲁兹社团对以色列国家高度认同的基础之上,^④但在某些历史时段,特别是当德鲁兹社团认为政府出台的某些政策触及公民间的平等问题时,^⑤双方的分歧会影响以色列的政治民主进程。阿拉伯基督徒社团与德鲁兹社团的交集主要体现在文化层面上,^⑥并且集中表现在宗教场所用地等引发的冲突上,阿拉伯基督徒社团认识到在与德鲁兹社团这样一个各方面与自己体量相当,甚至经济上比自己落后的群体在发生冲突时却屡占下风,主要就是因为德鲁兹社团因服役义务兵役制而具备了人员训练有素和武力担当后盾两大优势。因此,两个社团之间的复杂关系强化了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对服役的诉求,如果阿拉伯基督徒社团能够广泛服役,还有可能打破德鲁兹社团这个唯一服役义务兵役制的少数群体在国防军中所处的垄断性地位。

第四,阿拉伯基督徒社团的德鲁兹化,对以色列国家的构建也产生了影响。(1)在民族构建层面,以色列是一个多族群共同体,当局坚持国家的犹太属性和社会的政治民主这两者之间一直在寻求平衡从而避免造成社会分裂,^⑦当局支持阿拉伯基督徒社团的德鲁兹化,旨在密切少数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有助于实现这种平衡。(2)在国家构建层面,德鲁兹社团对国家的犹太属性和犹太复国主义始终持双重认可态度,^⑧并且已经成为境内对国家认同感最高的少数群体,主流观点普遍认为“以色列-德鲁兹模式”是以色列国家的一项成功典范,^⑨当局所支持的旨在提升少数民族对国家认同感的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德鲁兹化,会起到稳固以色列国家立国之本的作用,有助于实现国土完整、法制健全。(3)在公民构建层面,以色列是西方诸多信仰基督教国家的盟友,因此阿拉伯基督

① Ghazi Falah, "How Israel Controls the Bedouin in Israel",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 14, no. 2, 1985, pp. 35 - 51.

② 张瑞:《走出游牧:以色列境内贝都因部落的现代化之路》,载《世界民族》,2018年第6期。

③ Sylvia Saba-Sa'di and Ahmad H. Sa'di, "State Power and the Role of Education in the Constitution of Natives' Subjectivities: The Druze in Israel", *Social Identities*, vol. 24, no. 6, 2018, p. 817.

④ Nissim Dana, *The Druze in the Middle East: Their Faith, Leadership, Identity and Status*, Brighton: Sussex Academic Press, 2003, p. 12.

⑤ Tamar Saguy, Danit Sobol-Sarag, Samer Halabi, Katherine Stroebe, Emile Bruneau, and Siwar Hasan-Aslih, "When a Sense of 'We' Is Lost: Investigating the Consequences of a Lost Common Identity among Druze in Israel",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vol. 11, no. 5, 2020, p. 667.

⑥ Mahajne Ibrahim and Nuzha Allassad Alhuzail, "Culturally Competent Social Work in Arab-Palestinian Locality Welfare Bureaus in Israel: Is It Possible?",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vol. 11, no. 5, 2020, p. 667.

⑦ 艾仁贵:《一个还是多个:认同极化与当代以色列的身份政治困境》,载《西亚非洲》,2020年第4期。

⑧ Mordechai Nisan, "The Druze in Israel: Questions of Identity, Citizenship, and Patriotism",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4, no. 4, 2010, p. 580.

⑨ Kais Firro, "Reshaping Druze Particularism in Israel",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 30, no. 3, 2001, pp. 40 - 53.

徒社团的德鲁兹化进程,不仅得到了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普遍支持,并且被普遍视为以色列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巨大进步,^①因为该进程如若能顺利推进,则意味着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将像德鲁兹社团那样,拥有比以往相对更为广泛丰富的公民个人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

四、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德鲁兹化的特征

以色列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德鲁兹化最本质的内容和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以色列国家如何在这一进程中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以及如何借助这一进程协调并解决境内纷繁复杂的群体关系问题,面对特别是如何运用有效途径化解在少数民族问题上颇具争议的“分而治之”的声音,更有效地管理境内各阿拉伯少数群体以及其他少数群体。以色列阿拉伯基督徒社团的德鲁兹化,在发展历程、主导途径和实际效果等层面均展现出独有特征。

首先,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德鲁兹化的发展历程,源自时代变迁的影响。建国之初以色列当局便基于一项政治策略,试图大范围地招募阿拉伯贝都因人、阿拉伯基督徒、德鲁兹人和切尔克斯人加入以色列国防军,因为此时政府开始把境内的上述四类阿拉伯公民群体视为“好阿拉伯人(good Arabs)”而有别于阿拉伯穆斯林,^②但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对此消极应对,因其当时在以色列国家所享有的相对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所处的平稳环境抵消了其服役意愿。冷战期间,以色列阿拉伯公民内部各群体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层面的社会地位产生了某些变化,因此彼此的态度也有所调整,阿拉伯穆斯林认为阿拉伯基督徒“不是阿拉伯人”,而犹太人持相反观点,^③但是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对上述变化和称谓无动于衷,因为这些不会对其产生负面影响,也不会损害他们与阿拉伯穆斯林社团之间传统上以和谐为主流的关系,故而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并未积极考虑自身的德鲁兹化。冷战结束以来,阿拉伯基督徒社团感受到自身在以色列的社会地位面临着因其他少数群体的觉醒乃至崛起而带来的挑战,更为重要的是在中东地区“阿拉伯之春”给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基督徒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冲击,^④阿拉伯基督徒社团主动寻求增进与以色列当局的关系,展现出明显的德鲁兹化趋势和迹象。

其次,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德鲁兹化的主导途径,依托于兵役制度的推进。一方面,在“以色列-德鲁兹模式”的形成过程中德鲁兹社团从族群、宗教、服务、教育等四个维度完成独立身份构建过程,^⑤与之相比,阿拉伯基督徒社团独立身份的构建相对简单,阿拉伯基督徒作为基督教文化范畴的少数群体,宗教信仰方面在以色列乃至中东地区本就比较独特,^⑥相对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使其在族群、服务和教育领域构建独立身份比其他少数群体具有明显优势。另一方面,德鲁兹社团较快地接受义务兵役制,而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在兵役制度上如何与当局达成一致却相对困难。德鲁

^① Jerusalem Post Staff, “Knesset Christian Allies Honors Christian Friends of Israel at Gala Event”, *The Jerusalem Post*, February 2, 2020, <https://www.jpost.com/Israel-News/Knesset-Christian-Allies-honors-Christian-friends-of-Israel-at-gala-event-615917>, 访问日期:2022年11月9日。

^② Rami Zeedan, “The Role of Military Service in the Integration/Segregation of Muslims, Christians and Druze within Israel”, *Societies*, vol. 9, no. 1, 2019, p. 11.

^③ Charles Foster, “The Cross, the Crescent and the Star: Arab Christian-Muslim Rela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Israeli Occupation”, *Contemporary Review*, vol. 263, no. 1531, 1993, p. 75.

^④ Bernard Sabella, “The Status of Christians within Palestinian and Arab Society: Identity at a Transitional Time”, *Palestine-Israel Journal of Politics, Economics & Culture*, vol. 20, no. 4, 2015, p. 53.

^⑤ Oren Yiftachel and Michaly Segal, “Jews and Druze in Israel: State Control and Ethnic Resistance”,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 21, no. 3, 1998, pp. 476-506.

^⑥ Anan Srour, Shifra Sagy, Adi Mana and Serene Mjally-Knani, “Collective Narratives as Indicators of Examining Intergroup Relations: The Case of Palestinian Muslims and Christians in Israe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flict Management*, vol. 24, no. 3, 2013, p. 236.

兹社团的成员绝大多数是生活在加利利等山区的农民,下山当兵的服役经历使其便于就业,为之带来一系列正向资源,^①阿拉伯基督徒社团的成员绝大多数是生活在城区的市民,应征入伍至少在经济上不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机会,而且在服役期间直面战争的可能性有所增加。因此,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德鲁兹化虽然表现在诸多方面,但是如何就兵役制度与以色列当局达成一致则是本质问题。

最后,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德鲁兹化的实际效果,取决于该社团与以色列政府的共同利益。一方面,能否推进兵役制度取决于双方对安全利益的评估:有观点认为当局对阿拉伯基督徒征兵的目标是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是较小群体,只有受过国防军的训练并拥有武器才会免受其他群体的威胁,^②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对此大体上持认可态度,这与以色列当局积极吸纳阿拉伯基督徒入伍从而维护国家整体安全利益相一致。但是,德鲁兹社团成员服役后遇到了某些负面情况,例如有的德鲁兹青年在服役后失去了原有的土地,与犹太士兵相比在军中晋升机会偏少,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③加之入伍意味着直面战争的风险明显增加,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对广泛入伍持某种保留态度。另一方面,德鲁兹化在兵役制度以外的其他领域能否取得进展取决于双方对政治利益的考量:阿拉伯基督徒社团能否构建起独立族群身份、对以色列国家的认同感和忠诚度能否大幅提升、能否进一步广泛深入地融入以色列国家,取决于上述进程能否给双方带来切实有效的政治利益,^④例如阿拉伯基督徒社团能否接受当局将其登记为亚拉姆基督徒的权利,实际上涉及社团独立族群身份构建的问题,双方对此有不同的考量,以色列当局考虑的是这一举措能否给管理少数群体带来政治便利,而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关心的是能否给自己带来更多的政治权利。

五、结 语

对以色列当局而言,阿拉伯基督徒社团的德鲁兹化为其治理族群问题提供了途径和思路。“以色列-德鲁兹模式”的成功,使以色列当局处理纷繁复杂族群问题找到了一条有效的途径,为以色列当局整合境内全体公民,增强对国内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推进思路。因此,阿拉伯基督徒社团的德鲁兹化为以色列当局提供了一个历史机会,因为该进程如果进展顺利,将对增强阿拉伯基督徒乃至其他少数群体的公民意识、维护以色列国家的犹太属性、推动以色列的社会政治民主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对阿拉伯基督徒社团而言,德鲁兹化为其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方向和目标。“以色列-德鲁兹模式”的有效性与可借鉴性,为阿拉伯基督徒社团摆脱群体安全感的缺失等现实困境指明了具体努力方向,为其进一步全面融入以色列国家确立了总体追求目标。因此,总体而言德鲁兹化进程为阿拉伯基督徒社团提供了一种发展思路,该进程如果能够取得突破,对确保阿拉伯基督徒社团的群体安全、维护阿拉伯基督徒社团与其他群体的和谐关系、密切阿拉伯基督徒社团与以色列国家的关系,乃至提高阿拉伯基督徒社团在以色列国家的社会地位都能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阿拉伯基督徒社团的德鲁兹化进程会受到该社团和以色列当局之外第三

^① Ilan Pappé, “Moshe Sharett, David Ben-Gurion and the ‘Palestinian Option’, 1948 – 1956”, *Studies in Zionism*, vol. 7, no. 1, 1986, pp. 77 – 96.

^② Jonathan Cook, “Israel Wants Its Arab Christian-But Not Muslim-Citizens to Join Military”, *Washington Report on Middle East Affairs*, vol. 32, no. 8, 2013, pp. 16 – 17.

^③ Peled Yoav, “Ethnic Democracy and the Legal Construction of Citizenship: Arab Citizens of the Jewish Stat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6, no. 2, 1992, pp. 432 – 443.

^④ Salim Munayer and Gabriel Horenczyk, “Multi-Group Acculturation Orientations in a Changing Context: Palestinian Christian Arab Adolescents in Israel after the Lost Decad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vol. 49, no. 5, 2014, pp. 364 – 370.

方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在以色列这样一个以犹太人为主体的国家,在阿拉伯公民群体特别是阿拉伯穆斯林社团中一直存在着指责以色列当局在族群问题上实施“分而治之”政策的声音,批评者认为该政策是导致阿拉伯公民群体内部关系紧张、纷争频发乃至走向分裂的根源。因此,阿拉伯基督徒社团的德鲁兹化进程,尤其是加入以色列国防军和接受以色列当局给予亚拉姆基督徒新族群身份这两项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举措,难免会遭到阿拉伯穆斯林社团甚至其他阿拉伯少数群体不同程度的反对,在特定情形下还会出现各种形式的抵制。因此,虽然得到了以色列当局的大力支持,但是阿拉伯基督徒社团的德鲁兹化进程很可能会因为受到各类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曲折前行。

Abstract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status of the Israeli Christian Arab community has undergone great changes in the domestic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fields, prompting it to show an obvious trend of Druzification along the “Israel-Druze model”. Compared with the Druze community, the Christian Arab community has the same population size, unique culture, similar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and shared status quo, which have become a prerequisite for the Druzification of the Christian Arab community in Israel. The development of Druzification of the Christian Arab community in Israel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the embryonic stage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tate of Israel, the negative stage during the Cold War, and the positive stage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The Druzification of the Christian Arab community has three characteristic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prioritizing the military service system, and interests determining results. It has an impact on other Arab groups in Israel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state of Israel, and also plays a somewhat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ethnic governance of the state of Israel. But the Druzification process in the Christian Arab community, which is divisive within the community and controversial without the community, is likely to take a zigzag course forward.

(潘楠,讲师,浙江警察学院国内安全研究所,杭州,310053)

[责任编辑:于红]